

胡滨·主编

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

XIFANGWENHUA
YU

JINDAI ZHONG GUO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明清之际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概况	(14)
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	(14)
二、中国有识之士的主动求知	(21)
三、禁教与闭关	(25)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	(29)
一、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兴与经世派的崛起	(29)
二、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	(45)
三、鸦片战争期间制造新式船炮热潮的兴衰	(57)
四、中国传统观念的某些变化	(65)
第三章 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向西方学习	(87)
一、洪秀全接受并改造西方基督教	(88)
二、洪仁玕与西方文化	(115)
三、西方文化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影响	(129)
第四章 洋务派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引进	(144)
一、探本溯源	(144)
二、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	(149)
三、一定范围的自身反省与批判	(165)
四、“中体西用”	(177)
五、历史意义	(190)
第五章 维新派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理论的介绍 与传播	(197)
一、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高涨	(197)
二、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家	(201)

三、戊戌维新时期向西方学习的特点及其 历史意义·····	(244)
第六章 辛亥革命时期西学的传播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革命思潮的高涨·····	(246)
一、西学传播热潮的出现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 的演变·····	(246)
二、西学影响下的孙中山的理论思想·····	(287)
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移风易俗的尝试·····	(330)
第七章 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	(373)
一、比较与反思·····	(373)
二、国民性剖析·····	(381)
三、封建意识形态批判·····	(394)
四、民主与科学·····	(406)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424)
一、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424)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三个阶段·····	(429)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442)
后 记·····	(448)

前 言

我们撰写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中国近代史，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阐明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论述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基本看法。

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欧洲于14世纪发生了文艺复兴，它以理性、人文主义和科学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后二、三百年间，欧洲又相继发生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最后资产阶级于17、18世纪夺取了政权，接着进行“产业革命”，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社会发展十分迅速。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滞在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对外部世界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茫无所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已落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鲁迅说：“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自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国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人们还是莫明其妙。”①

落后必然挨打。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所说：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143页。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从此，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由封闭的封建社会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对外开放，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因为被迫开放意味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的主权遭到践踏，中国人民遭受奴役和欺凌，所以它当然是一件坏事。但另一方面，它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迫使中国人睁开眼睛观察和了解世界，促使近代中国好几代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谋求祖国独立富强而进行新的艰苦探索，保守的、沉闷的、落后的中国出现了生机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迫对外开放在客观上又变成了一件好事。

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伴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军舰、大炮、鸦片和商品来到中国，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文化面前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它的最初反响如何呢？

广大人民群众在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出于民族的义愤，不容易把一种先进的文化同野蛮的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区分开来，因而一下子很难认识和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长处。大多数封建士大夫背着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的沉重包袱，怀着强烈的“夷夏之辨”的心理，不愿意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了憎恶和鄙视的态度。他们是后来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的前身。当时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能够摆脱各种偏见，正视现实，逐渐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长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便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表现出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爱国或进步人士为挽救祖国危亡寻求真理的方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四个人，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他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水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和不同的程度上面向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用来作为起衰振弱、改造中国的工具。

洪秀全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他出生在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的广州附近的花县，所以有条件较早期地接触到西方的基督教。他接受了基督教中的某些原始教义和宗教仪式，用来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于19世纪50年代初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利用基督教作为发动工具的农民起义，反映了近代中国刚刚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代特征。基督教绝不是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加上农民阶级本身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绵延了十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失败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近代中国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要关头，出面倡导变法救亡。他采用开学堂、设学会、办报纸等西方国家的新式宣传手段，传播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和制度方面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反对进行枝枝节节的改革，号召实行“大变”、“全变”，即改变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英、日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他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起，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民权、平等等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作为封建主义文化核心的纲常名教，于1898年把维新运动推向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了高潮。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个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是被人们久已公认的。

严复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最出色的启蒙思想家。他早年留学英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具有较深刻的理解，返国后一面执笔撰写政论性文章，一面着手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名噪一时，影响极大。他的译著主要有：（一）赫胥黎《天演论》，1898年4月出版；（二）亚当·斯密《原富》，1901—1902年出版；（三）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年出版；（四）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五）甄克思《社会通论》，1904年出版；（六）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年出版；（七）穆勒《名学》（前半部），1905年出版；（八）耶芳斯《名学浅说》，1909年出版。通过这些译著，严复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这八大译著所包涵的理论，构成了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对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具有震聋发聩的启迪作用。当时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通过严复的译著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的。

孙中山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年轻的时候便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后来又周游世界，考察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从19世纪末年起，他便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合众政府”，开始从事武装起义活动。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联合当时旅日的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建立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不久他把这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孙中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学说，企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美、法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家。他不仅运用批判的武器，对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

专制制度进行口诛笔伐，而且对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值得注意的是，他既羡慕西方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劳资的对立，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停留在“媲美于欧美”上，而应“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这当然只能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空想。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军阀们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民国名存实亡，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尊古复古的逆流，政治上复辟风甚嚣尘上，到处呈现一片乌烟瘴气的景象，很多知识分子茫然不知所措，陷入苦闷徬徨的境地。1915年，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改造国民性”等主张。他们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实质，要求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到中国来，认为只有德、赛两先生才能医治中国封建主义的痼疾。他们对封建传统文化批判程度之激烈，范围之广泛，内容之深刻，超过了以往的历次批判运动，是近代中国最彻底的一次思想启蒙，从而把戊戌维新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潮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

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但它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最先进文化的结晶。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拯救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向西方国家探求富强之道，直到学习了马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克思主义，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①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潮流中，封建地主阶级的动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封建地主阶级分裂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唯经是尊，唯古是尚，死守“夷夏之大防”，把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反对学习一切新事物，幻想开历史的倒车，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甚至主张“用夏变夷”。倭仁于1867年在有关同文馆招收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争论中所说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等言论^②，可以代表这一派人的中心思想。洋务派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集团，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级开明派。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军火武器的优越性，于是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始，逐步扩展到建立工矿、交通、电讯等民用企业，从而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他们仅承认中国在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落后于西方，认为中国的封建典章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远远超出于西方国家之上。李鸿章于1865年筹办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时曾上折奏称：“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獠狃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视，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页。

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① 这些言论，基本上反映了洋务派早期的共同看法。从这种认识出发，洋务派把引进西方文化的范围仅限于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即表层文化），并企图用这些东西来捍卫中国的封建统治。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这一步毕竟迈得不大、不快、不好。他们倡导的洋务运动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初，终止于90年代中期，持续了30多年，收效甚微，人们有种种理由批评它、指责它，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至于20世纪初年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所施行的新政，其中包括预备立宪的措施在内，虽然也具有学习西方文化的意义，但那是清王朝在革命形势压力下被迫作出的某些让步，是被动地、消极地，而不是主动地、积极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以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十分有限，与洋务运动时期的情况显然不可相提并论。辛亥革命前10年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起主要作用的不再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各派系（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时候起，学习西方文化和促使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资产阶级的肩上，封建地主阶级已成为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

二

纵观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大致上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世纪40、50年代开始，至90年代中期为止，主要学习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以及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表层文化，表现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

^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5页。

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袖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方案，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付诸实现，反而被洋务派官僚们逐步实现了，这反映出向西方学习在当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中国社会没有出现新的阶级以前，洋务派官僚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肩负起引进西方文化、促使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在这个阶段，学习西方的内容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这是符合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的，表明学习西方刚刚开始，中国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反映出近代中西文化开始接触时期的特点。

第二阶段，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20世纪最初10余年为止，主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理论与制度，表现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在这个阶段，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透过表层文明，觉察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仅在于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而且在于它们拥有先进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引进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思想武器，批判“君权神授”与三纲五常等陈腐的封建教条，并先后着手进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尝试。虽然他们所作的尝试都失败了，但却大大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自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主要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表现为李大钊、陈独秀等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实质。他们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作为思想武器，对几千年来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开火，使人们开始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虽然仍根深蒂固地继续存在，但却遭到了一次

前所未有的大扫荡，开始发生了动摇。新文化运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非自近代开始。早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曾经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若干有关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及哲学方面的书籍。当时输入的这些西学，传习的范围非常狭窄，仅限于宫廷和少数上层封建士大夫，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到清朝雍正年间以后便中断了。近代的情况与以前大不相同，中国不再是被动地输入西方文化，而是主动地加以引进，用来改变近代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以达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目的。传习的范围，由中上层封建士大夫逐步扩大到各个阶级、阶层的知识分子，学习的内容也逐步深入，由表层文化向深层文化延伸，形成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潮流。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进，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首先，它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其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出于近代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对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起了推动作用。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成为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引发了洋务运动；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企图改造中国的模式；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的锐利武器。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进，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五十余年间，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贵义贱利、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等观念，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发生了动摇；自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的20余年间，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君贵民贱、纲常名教等观念，也相继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虽然还没有土崩瓦解，但至少是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这些就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进，并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使中国强盛起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①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怀疑和认真思考，客观现实迫使人们改弦更张，另外谋求新的出路。最后，经过1917年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广大人民接受之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繁荣富强才真正有了希望。历史证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虽然起了某些积极的历史作用，但那是没有前途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振兴中国。

三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就是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是一股时代潮流，持续了将近八十年之久。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倡导起，经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直到李大钊、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陈独秀等人发动新文化运动为止，除洋务派官僚之外，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是救亡图存，所以人们把学习西方文化和挽救祖国危亡结合在一起，认为学习西方文化是挽救祖国危亡的必由之路。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中，不愧是先进的中国人、出色的爱国主义者。至于洋务派，成员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他们举办洋务事业，也绝不是为了卖国，而是含有抵御外侮、图谋富强的目的。李鸿章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初期便曾经说过：“我能自强，则彼族（按：指外国侵略者）尚不至妄生覬觐，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①曾国藩也曾经说过“明靖内奸，暗御外侮”^②的话。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制洋器”的目的，虽然是出于“剿贼”的需要，但主要仍是着眼于“御侮”。后来他们筹办海防和兴建海军，显然是为了对付来自海上的侵略。至于他们兴办民用企业，是企图与洋商“争利”，具有挽回利权的积极意义。洋务派虽然缺乏象林则徐、魏源等人那样高昂的爱国激情，但他们同当时那些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地主阶级顽固派比较起来，显然要开明得多、先进得多。同时，洋务派成员中对外屈膝求和、签订辱国丧权的不平等条约的人只是极个别的；相反，许多洋务派官员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不可一笔抹煞。事实上，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沈葆楨率军渡台，迫使日军撤出台湾；就不会有左宗棠挥戈出塞，收复新疆；就不会有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迫使法国议和；就不会有甲午战争期间黄海海战的壮烈场面，日本侵略军就可能长驱直入，直捣京师。他们中间那些抵抗过外国侵略的人们，都堪称爱国人士。因此，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人士中，爱国是他们共同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

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13页；卷4，第17页。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5页。

第二，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三百多年。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短短的80年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百多年的历程。在中国资产阶级出世以前，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并着手付诸实践，不自觉地促使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开始起步。中国资产阶级正式形成以后，促使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便落到了资产阶级的肩上。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便忙于从事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于是便从他们的西方资产阶级前辈那里借来了启蒙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并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因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主要是匆匆忙忙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并没有经过好好地消化和融会贯通，它本身显得很粗糙、很不成熟、很不完备，没有多少创造性。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第三，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文化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洪秀全学习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时，结合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农民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时，一开始便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诸国富强之术”。^①后来，他们的这种思想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把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作为主体，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作为谋求富强的手段。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民权学说，试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家，但他又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给他的维新变法思想披上一件古色古香的外衣。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便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企图仿效美、法两国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他晚年曾经这样说过：“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

^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①可见他并没有完全摒弃中国固有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虽然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但实质上他们所反对的只是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独尊的儒家文化，而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大都予以肯定。即使对于儒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都是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不是全盘否定。他们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所掀起的尊孔逆流，但却承认孔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例如，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哲人”，但不是如封建统治者所吹捧的“万世师表”。^②陈独秀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设若中国自周秦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已与已成者不同。”^③他们所要求的，只是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反对封建的文化专制。不过，总的说来，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分辨不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从而不可能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作出最好的抉择。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曾经对近代中国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充分反映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轨迹。

上述的一些基本论点，我们将在下面有关各章中分别展开论述。

①《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

②《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84页。

③《陈独秀书信集》，第118页。

第一章 明清之际西方文化 传入中国概况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趋势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则是提倡人性解放和平等的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它批判和冲击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特征的程朱理学，动摇了禁锢人心的封建意识形态，促使一批有识之士走出知识分子的科举入仕的象牙塔，转而从事科学的研究和实践，由此推动了科学的复兴，使中国古代的科学发 展在一度消沉之后，从晚明到清初，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西方传教士恰于此时东来，他们以学术作为传教的先导，带来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科学和哲学思想。西学输入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因而得到了中国社会中一部分明智之士的主动响应，成为中西学术思想方面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和交流，影响和启发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

1. 传教士来华的起止时间和人员概况

16世纪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壮大，新兴的市民阶级对于罗马教会的腐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反感，他们认识到教会的神权统治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巨大障碍，便发动了反对教皇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由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否定了教皇和教会在解释教义方面的权威，很快